对历史记忆的争夺必须寸土不让

□ 任宇波

对历史记忆的争夺，实则是和平年代对正义与邪恶、光明与黑暗、进步与反动的一次深刻辨认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

9月3日，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上，有两幕场景感人至深：

一幕是老兵。本次阅兵，安排了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、老同志、老民兵、地方支前模范代表和抗战烈士亲属代表到天安门现场观礼。习近平总书记登上天安门城楼时，同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亲切握手，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。

一幕是战旗。由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的战旗方队中，“梁山战斗英雄连”“即墨城第一连”“岱崮连”等10多面战旗，承载着山东抗战史的荣光，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。

一位老兵，就是一部“活的抗战史”；一面战旗，就是一页活的史册。历经80载峥嵘岁月，英雄呐喊犹在耳畔。现实时刻警醒我们，历史从未远去，不能忘！不敢忘！

今年暑期档，多部以纪念抗战史为主题的电影作品上映。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以28.9亿元票房成为暑期档冠军；将于9月18日上演的电影《731》，“想看”人数累计突破了650万大关，断层领先。

同一主题引发的观影热潮，映衬出抗战记忆在国人心灵中的重要位置，也反映了国人对历史真实、历史正义的集体诉求。这种情绪早已超越娱乐需求，体现出今天国人深厚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责任。

但与此同时，面对历史伤痕，也有人陷入纠结，比如有家长对是否应该让孩子接触这类电影，有点拿不定主意。舆论场中也出现一些杂音，比如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被少数人质疑为“进行仇恨教育”。类似问题和论调，每逢重要节点总是沉渣泛起，不能不引起重视与辨析。

历史记忆，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但历史，也的确存在记忆与遗忘的争夺。记住什么，遗忘什么，哪些是应该传下去的历史，哪些会存在“集体失忆”，在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，在不同的利益、立场面前，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。这是不得不令人警醒的。

早些年，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，就是因为极少有人系统地收集相关文献，并向西方公众讲述这一历史事件。乃至到了今天，日本仍在继续通过教科书删除侵华史实，用错误史观影响年轻一代。

遗忘，是对历史最大的背叛。揭露历史真相，便是打破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行动。无论是对历史史实的挖掘与还原，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艺术呈现与表达，都在于用真相消解仇恨，用记忆守护和平。

比如，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•贝托鲁奇执导的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于1988年在日本上映时，被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删除了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30秒镜头。贝托鲁奇发现后震怒，公开反对并迫使发行商立即恢复了被删减的镜头。

比如，记者南香红曾花费约5年时间调研、采写，2005年发布近六万字的长文《极罪：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，同年出版的《王选的八年抗战》一书，着重记录王选带领受害者家属等人发起的对日细菌战诉讼。王选的那句“看见了，就不能背过身去”广为传播，令无数人动容。

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从国家层面的重视，到平凡勇者的行动，都在以持续的挖掘与记录，表达与反思，对历史遗忘作出我们的回应，由此进一步塑强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。这也是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的应有之义。

“今天，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、对话还是对抗、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。”对历史真相的揭露，对历史记忆的争夺，实则是和平年代对正义与邪恶、光明与黑暗、进步与反动的一次深刻辨认。

这样的争夺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对此，我们必须寸土不让！因为只有认清史实，还原真相，才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，也才能为未来作出正确抉择提供根本前提。

漫评

多管齐下根治电动车“拆改病”

【事件】

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17761—2024），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。新国标规定，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25km/h，超过25km/h时电动机应停止提供动力输出。

【点评】

部分电动自行车之所以能超速行驶，是因为过去非法改装很嚣张，给交通安全埋下重大隐患。对此，各地或通过立法或加强执法进行整治，但效果比较有限。新国标专门从技术层面设置“防篡改”门槛，理论上看，非法拆改将得到有效遏制。不过也要防止出现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。

这需要有关方面在新国标实施后，一方面严格监控“防篡改”是否存在技术漏洞，确保堵住非法改装的源头，并对改装窝点露头就打；另一方面通过“电子警察”抓拍电动自行车超速，严格执法，切实让狂飙的电动自行车慢下来。

速度固然重要，但没有安全托底，再高的速度也会瞬间清零。只有从生产者、销售者到使用者达成深度共识，才能根治电动车的“拆改病”。（文/冯海宁 图/徐进）

整治高额彩礼要坚守法治底线

□ 何勇

综合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是党中央关注、老百姓关心的一件民生实事。据悉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部署，推动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落地见效。

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。然而，近年来，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，彩礼标准一路攀高，动辄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“三斤三两”的高额彩礼。这不仅让恋爱婚姻变质，而且成了许多农村青年的“不可承受之重”，压得很多农村家庭喘不过气来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高价彩礼还造成一些农村家庭因婚致贫、因婚返贫，甚至引发家庭悲剧、暴力冲突等。2021年10月11日，1992年出生的王某因无力支付结婚彩礼，入室抢劫27岁女子郭某，为阻止其呼救，王某捂嘴、掐颈致郭某机械性窒息死亡，被最高法核准死刑。

整治高额彩礼问题，让彩礼回归合理范围，已经成为老百姓的现实诉求和期盼，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。从2019年开始，中央一号文件先后六次提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治理，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。民政部则把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作为婚俗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
从这几年整治高额彩礼问题情形来看，应当说，各地摸索出了不少接地气的好办法、好经验和破解之道，取得了积极成效，有效减轻了农村家庭彩礼负担，让农村居民切身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。

但也要看到，一些地方为了整治高额彩礼，丢失了法治思维，逾越了法治底线，采取侵犯农村群众合法权益的方法，让整治高额彩礼变味，背离初衷，好心办坏事。比如，某地村委会曾以村规民约形式，设置彩礼最高额度，对彩礼超额的村民进行罚款，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影响在村委会办理各种手续。

婚丧嫁娶归根结底属于老百姓私生活范畴。治理大操大办婚丧嫁娶、高价彩礼等陋习，本质上是移风易俗。树立文明新风，需要用好教育引导、文明劝说、表彰奖励等办法，而不是简单粗暴采取于法无据的惩罚手段。因此，整治高额彩礼问题，需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”协同推进，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，关键是要坚守法治底线，不能为了达到整治高额彩礼目的而采取不合法手段，这是不可突破的底线。

总而言之，整治高额彩礼，推动移风易俗，既要立意良善，手段也得合法。

从李子柒到李福贵 看乡村叙事爆火的双重密码

□ 牛同

最近，“李福贵”火了。

开着小货车在山村中叫卖，车斗里堆着食品和日用品，旁边围着买货的留守老人——这是27岁河南姑娘李亚云（网名“李福贵”）的视频日常。当她用自媒体收益带46位老人去郑州旅游，老人们面对镜头露出的拘谨与雀跃，让一条视频收获960万点赞。

在短视频平台上，李福贵的粉丝已超千万，拥有不少百万播放的作品。但她的视频形式，却一直是“反流量逻辑”的——无滤镜、无脚本，没有戏剧冲突、贩卖情怀，时长多为10分钟以上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她用镜头慢慢记录着帮老人拍照、晒麦子、卖货让利的流水账日常，展示乡村最质朴、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精准击中观众对乡土的怀念，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细腻、真挚情感的向往。

在众多乡村博主中，李福贵代表的是“真实”。她真切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诚实地记录和呈现与周围村民的联结。视频里，当她喊着“打豆腐的来啦”穿过村落，就像移动的“供销社”，老人们的笑脸与皱纹，构成最朴素却最动人的画面。而车上载的不只是商品，更是老人们的期待：一位老人笑着说“孙女在手机上看见我了”，还有网友在李福贵镜头里看见自家老人，随即将“有空就回”的口头承诺变为实际行动。这种走出视频的互动，恰恰说明她的视频具有引发共鸣的现实力量。

这让人想到了李子柒——以镜头重构田园风光与传统技艺，把乡村生活打造成一个浪漫而唯美的精神空间。她的视频不仅满足了都市人对理想乡村的想象，更让世界通过美学符号认识了中国乡村。

李子柒呈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乡村图景，借“美学”手法讲述乡村故事，满足观众对田园牧歌的想象；李福贵则以“真诚”打动人心，唤醒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情感记忆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她们殊途同归地讲述着朴素的田园浪漫，共同构成了乡村叙事的双重密码。

在国际传播层面，李福贵的真诚叙事同样重要。视频中未加修饰的日常——乡间尘土、邻里互动，恰恰构成最鲜活的中国乡村画像。没有贩卖苦情、贩卖焦虑，众多农村老人摆脱了“他者叙述”的桎梏，在镜头前从容地生活。前不久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关注到李福贵的故事，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点赞了她的专访视频，让全球观众看见了一个鲜活而温暖的中国乡村，也再次证实真实记录的力量。

无论是李子柒的田园诗，还是李福贵的生活流，从美学到真实，乡村叙事的多元路径，为中国故事的传播提供了深刻启示。可以看见，乡村叙事只有扎根于对土地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执着，才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。正如李福贵所说：“要像向日葵一样，永远向阳而生。”这种坚韧与温情，正是中国乡村最动人的精神底色，也是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生动源泉。

开学季，在焦虑中达成共识

编者按：开学伊始，各种教育话题备受关注。有的是老问题，比如家校责任如何划分；有的是新动向，比如午休课桌椅新国标；有的是“新瓶装老酒”，比如对大学生开“家长会”的讨论，还是高等教育往何处去的深层次议题。争议和质疑并不可怕，因为共识正是在碰撞间达成，教育改革路径正是在此间摸索而出。

“父母好好学习”没毛病

□ 赵晓昕

每年开学季，焦虑从不只属于孩子。近日，山东一所小学要求一年级新生家长集体宣誓“父母好好学习，孩子天天向上”，在网上引发关注，“又在给家长制造压力”“就是在转嫁责任”等吐槽声量不小。面对质疑，该校老师称本意并非让家长学习具体的课程知识，而是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、如何给孩子做榜样等。

在开学第一课中，对家长进行家校共育的培训，正是推动家校形成合力，让教育形成闭环的重要一步。“我用行动去影响孩子”“我用心去陪伴孩子”“我控制自己的情绪”等既寄托了学校的期盼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教育起到了引导作用，在“幼小衔接”的关键阶段，学校的出发点值得肯定。

然而，为何这份善意未能完全传递？厘清背后的社会情绪，才能找到推进家校共育的发力点。

部分家长的抵触情绪，首先针对“宣誓”这一形式本身。公众对各类“走过场”的仪式抱有天然的警惕，当集体宣誓出现在教育场景中，一些人也容易产生条件反射式的疑虑，将其与“表演”和“空谈”画上等号。

更深层次的抵触情绪，则来源于一些学校在家校共育边界划分上的模糊。

近年来，家校职责错位现象屡见不鲜。有的学校在开学时要求家长打扫教室，有的强制给家长排班轮值“护学岗”，有的要求家长轮流到校监督晚自习……不少家长在肩负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同时，又平添了新的工作量，个人精力与对学校的信任不断消耗，也形成了“一碰即炸”的情绪敏感点。因此，当学校再发起需要家长配合的活动时，哪怕初衷良好，也容易被置于怀疑的目光下审视，认为有“任务摊派”“转嫁责任”之嫌。

然而，因部分执行层面的问题，就全盘否定家校共育的价值，抗拒在家庭教育中投入更多精力，无疑是因噎废食。孩子的成长，离不开学校的悉心教导，同样离不开家庭的言传身教。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、如何管理情绪、如何树立榜样，这些都是为人父母需要不断研习的“必修课”。这一点，是争议双方都难以否认的共识。

因此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“父母要不要好好学习”，而在于“如何让学习真实发生”。对家长来说，行动永远比话语重要，对学校而言也是如此。

一方面，学校可以提供更务实、更细致的支持，例如为家长提供有针对性的专题讲座、沙龙交流，或可供参考的亲子阅读书目、沟通技巧指南等具体资源。另一方面，学校也必须最大限度厘清家校职责边界，从而重建家长的信任。事实上，教育部也已多次明确要求，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、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。家长与学校各司其职、配合得越好，教育才会越成功。

面对争议，当地教育部门也不必有舆情恐惧。百花齐放的公共讨论，本质是公众对高质量、真合作的家校共育的深切期待。不妨抓住这个契机，推动学校将誓词转化为一套可操作、可持续的支持体系，争取更多家长的认同，从而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，真正为孩子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。

告别午休“趴睡” 仅有新国标不够

□ 江德斌

近日，市场监管总局（国家标准委）批准发布《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》（GB/T 46016—2025）国家标准，将于2026年2月1日正式实施。

传统课桌椅设计仅考虑坐姿需求，学生在午休时以趴睡姿势将就，易导致颈椎变形、血液循环不畅、视力下降等问题，且影响睡眠质量和下午的学习状态。新国标午休课桌椅在设计上，充分考虑了学生学习与午休的不同需求，实现“躺睡”自由，正是对午休痛点的精准回应。

但可以预见，新国标午休课桌椅从落地到全面普及，并非易事，面临诸多挑战。部分学校尤其是老旧校区，教室空间有限，新午休课桌椅的摆放成为难题。一些学校班级学生较多，教室相对拥挤，难以实现午休课桌椅的展开。而且，新国标下的课桌椅在功能、材料和工艺上都有提升，成本相应增加，对于一些教育经费紧张的学校而言，大规模更换课桌椅压力较大，也是部分学校需克服的障碍。

各地应积极探索解决方案，学校可通过合理规划教室布局，灵活调整空间。而根本的解决之道，还在于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”。当前出生人口变化导致适龄学生减少，正是推进小班化的契机。政府需加大教育投入，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学校更换课桌椅，通过规模化采购降低成本。同时，针对经济落后地区、偏僻乡村学校等，可以通过异地支援帮扶、福利彩票基金赞助、社会慈善机构捐赠等途径，逐步帮助更换午休课桌椅。

期待明年新国标正式实施后，午休课桌椅逐渐成为中小学校的标配，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告别“趴睡”，在舒适的午休中焕发更多活力。

反对大学“家长会” 是在反对什么？

□ 关育兵

大学生也要开家长会？近日，国内多所知名高校，因为在全校或学院层面举行“家长会”，引发了热议。反对者认为这是在培养“巨婴”，支持者则认为这有利于强化家校沟通。

其实，一些大学设置家长会的初衷，是介绍自身特色和培养机制，不能和高中阶段的家长会直接画等号。其复杂背景是，今天大学生的升学、就业等路径，部分家长参与得更多了。而在生源竞争的背景下，高校发展也到了质量竞争和突出特色的阶段。

但同时，大学管理“高中化”趋势也确实存在。部分反对者，反对的正是这种“高中化”趋势。

早晚自习、晨跑打卡、统一熄灯、家长群通报成绩……越来越多大学正以“为学生负责”之名，行无微不至之“管”。有学者指出：“当代学生成长于更加精细化的教育环境中，从小学到高中的严格管理让部分学生缺乏自我管理的训练机会。”而学校也面临着“不出事”逻辑的压力——家长和社会舆论往往将学生问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学校，使得高校通过严格管理来规避风险。

深层次看，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教育体系中持续存在的矛盾：短期安全与长期成长之间的张力。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，我们过于强调知识传授和规则秩序，却相对忽视自主意识和责任感的培养。当这些学生进入大学，教育者和家长都不放心突然放手，于是形成了大学教育高中化的奇特现象。

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教育理念的系统性转变。大学应当勇于重新定义自身角色——不是高中的延伸，也不是社会的简单预备，而是允许试错、鼓励探索的过渡空间。具体而言，可以采取“渐进式自主”培养模式：大一阶段提供适当引导和支持，随着年级升高逐步扩大自主权；建立“安全网”而非“束缚绳”，明确行为底线而不过度干预过程；用丰富的课程选择和实践活动替代统一强制的形式化安排。

同时，家长和社会也需要转变观念——大学是学生成长为成年人的最后关键阶段，适当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必要的学习经验。社会应当建立更加理性的责任认定机制，让学校能够放心地给学生更多自主空间。

大学的使命，在于培育各具特色的、能够独立思考的成熟个体。之前那种“上了大学就完全自由了”的放纵，和现下大学“高中化”的趋势都要不得。身处高等教育环境中的大学、学子和家长，都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的“度”。

沉下去观察，立起来评说
官方微信：捞舆工作室
投稿邮箱：dzrbplb2016@163.com